

中国图书馆学
教育之父——
沈祖荣评传

程焕文 著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中国图书馆学 教育之父—— 沈祖荣评传

程焕文 著

本书据台湾学生书局 1997 年 8 月初版排印
(原书前所附图片未排印)

谨以此书
纪念和缅怀

沈祖荣宗师

暨二十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先驱们



沈祖荣肖像

沈 序

程著“中国图书馆教育之父——沈祖荣评传”终于出版了。这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学生书局告诉我“书稿约二十八万五千余字，及二十五张图片，以二十五开版面计约四百五十页”（1996年12月9日函）；并且要求我“先看一遍，略作补充，写作序文”。这是著者、出版者和我之间原有的谅解，写作对象又是我的父亲，无论从天理、国法、人情哪个角度来看，我都不便拒绝，也许我并不能任（这点我在下文中略加解释），但我必需担当下来。

著者程焕文教授是中國大陸典型的青年才俊，誠如他指出我和他有幾次見面暢談的機會：第一次是1990年9月台灣十四位圖書資訊學教授，訪問大陸圖書館和教學院校，我單身去了廣州，在中山圖書館黃俊貴館長為我召開的座談中看見程煥文教授為我留下深刻印象；第二次是1995年11月，我大病之後勉力前往廣州接受廣東圖書館學會所頒名譽理事聘書，在中山大學作學術演講，名學者中山圖書情報系主任譚祥金教授是演講會主持人，程煥文教授則負責介紹演講人，他的介紹詞講了至少二十分鐘以上，沒有一句廢話，對於我的工作、寫作和思想如數家珍。我對他的認真態度，大為驚訝。自從那天以後我對這位青年學人另眼相看，多次接觸之間當然談到他有意寫作這部專書的問題，他的計畫極為龐大。回到台北，1996年1月我又收到他的來信，說他的寫作可能稍為延後，並附寄寫作大綱初稿，征求我的意見，這份大綱計有三篇

共二十一个章节，加上参考文献，两项附录，年谱和著述目录，我略一过目，几乎跳了起来，工程如此浩大，程焕文教授哪有这多时间，如何搜集这么多资料？从他信中口气看来，他是一个坚持零缺点的人，他力求内容正确资料完整，加之他那时还有几篇必需准时交卷的文章要写；我当时想写作这本专著程焕文教授可能遭遇到困扰，可能搁笔；现在这本著作能够问世，我有无限的惊喜（pleasant surprise），所以在本序首端第一句话用了“终于”两个字，我说这本著作“伟大”因为这部书不仅是“我国第一部有关图书馆人物的传说”（见著者自序）而且是我图书馆事业的近代史。

程焕文教授是有资格写这本书，他花了近十年的时间，不断检索文献，收集资料，因此被大陆图书馆界称为“沈祖荣研究专家”，我有没有资格写序却有疑问，我想略为说明。

一、我很少机会亲近父亲

我于二十八岁经过第二届公费留学考试出国深造，二十九岁开始就和父母不通音讯，而居留国内二十八年之中，除小学六年级前住在家中外，从初中一年级即在文华中学住校，我的二位姐妹也是一样，她们在圣希理达女中住校，姐姐更在高中时去上海在中西女塾上学，对日抗战发生后，大姐进武汉大学、小妹进南开高中、燕京大学，我进复旦大学转华西大学借读。这些学校都不在重庆，寒暑假也不回家，因为父亲母亲都忙，我在小学时常常一人，有时和妹妹用餐，餐桌上难得看到父母俩老。我念文华中学时每月到文华公书林父亲办公室拿零用钱（每月大洋五角），说来有罪，我从来没有看过父亲写的文章，家中也没有族谱，我也没有机会供养父母一天。

二、父亲是怎样一个人

我对父亲的了解，相当有限，我只知道他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会跳舞，喜欢踢足球，有一次受伤颇为严重，球鞋也就置之高阁，他比较喜欢听京戏，但是很少有机会去欣赏，他终年一件布大褂，有庆典时加上马褂，他就是这样打扮出国到罗马出席 IFLA 的国际会议，有时也穿中山服，但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穿西服，只看见他过去穿西服的照片一两张，他不善言词，不苟言笑，对子女的训示也不多。

三、父亲年轻时的劳动背景

程焕文教授说父亲年轻时家境不佳，曾经做过纤夫和饭馆跑堂，这对我而论是件新闻，我从来没有听父母讲过，也不觉得他有劳工背景，做过劳动者是件好事，我自己在美国念书时也在餐馆做过洗碗工人 (Dish Washer)，也在汽车零部件工厂做过吸油器 (Oil Eilter)，我的儿子也不知道。

四、母亲扮演的角色

我们沈家是女性社会，妈妈当家，她说了算数，母亲中学毕业 (训女中学)，她酷爱社会活动，担任武汉女青年会会长，教会妇女传导团团长，文华圣诞节董事长，这所圣公会 (Episcopal Church) 在武汉为最重要的礼拜堂，教友是文华校园各学府的中外教职员，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文华中学校长卢春荣，文华童子军专科学校

校长严家麟,文华图专校长我父亲和若干中外长老都是董事,在母亲领导之下,母亲口才特佳,我曾看见她在文华公书林礼堂时女青年会会友演讲,一个小时没有看稿,由于她的能力,父亲对她言听计从,美国学者白齐茹(Cheryl Beettcher)在“图书馆与文化”(Libraries and Culture)中所写“沈祖荣与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Samuel T. Y. Seng and Boone Library School)一文中,指出父亲在出国留学时曾有一个选择,学习图书馆学或童子军学,有点举棋不定。母亲的主张决定了父亲的前途,这篇文章何光国曾经翻译在中国图书馆学会会报上发表,程焕文教授说我父母的婚姻是韦棣华女士(Mary Elizabeth Word)撮合的,我倒是第一次听见。

五、父亲的贡献

父亲一生献身图书馆事业,协助韦棣华女士建立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和文华公书林,他首先提出服务的口号,推出巡回车,和实行开架式,编制仿杜威十进分类法和标题总目,在今天看来也许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在父亲那时候是破天荒的大事。

我认为父亲的伟大是他协助韦棣华女士争取庚子赔款退回我国,部分退款用于建设我国图书馆事业,他的中国图书馆事业本土化的坚决主张是我深感骄傲的。

程焕文教授在两代巨擘:二十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的骄傲提到我使我愧不敢当,白齐茹(Cheryl Beettcher)博士也提及我和美国图书馆学会国际关系部主任布朗博士(Charles Brown)为我国图书馆教育拓张计画换立签定协议的事等,我深感惭愧。

这部书还有一个值得表扬之处,就是促进了海峡文化的交流,这对国家统一当然是有贡献的。

沈宝环 谨序 1997年1月22日

沈序：永恒的纪念

我怀着感谢和激动的心情读完了程著《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评传》。程焕文教授在从事教学的同时，系统地收集、整理、撰写先父沈祖荣的生平事迹，总结先父的学术思想，正确评估了先父对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创建与发展的贡献。本书的编著反映了作者对先师的敬爱，对历史的尊重，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神，这本书是写不出来的。为此，我对程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

手捧程著，边看边忆，思绪起伏，心如潮涌，先父的往事历历在目。我有兄弟姐妹四个，我是最小的，所以父亲、母亲及哥哥、姐姐都昵称我为“小妹”。家里的大小事情一般都是母亲说了算，母亲对我们管教极严，父亲比较宽容，是真正的慈父严母。母亲的社会活动很多，不仅管好家务和子女的教育，连学校的事情，母亲也从旁给父亲以帮助，似乎她有意把一切事务都担起来，好让父亲全心全意地办好他的图书馆事业。

我从初中起就住校，只是星期天和寒暑假才和父母一起生活。那时年纪小，程著中所述的许多事情我不清楚，我看到的只是父亲在家的生活和工作情况。

父亲总是天不亮就起床，轻轻洗漱完毕就关进房间看书写作，等我们起床时，他已经做完了他的“功课”，有的时候早餐都给我们做好了，他不抽烟、不喝酒，不爱社交应酬，爱好打球、游泳，还经

常带领图专师生一起做早操。

父亲从不讲究吃穿，脾气很好，平时总是细声细语，慢条斯理地讲话，有时急得脸都红起来，但仍是小声批评，绝不怒吼斥责。

我父母与文华图专师生的关系都很亲切，他们对我父母也很尊重。我父亲把他们看成自己的亲人一样，我经常看到他们在我家与父母谈心。有的教职员家里出了矛盾，父亲还亲自上门调解。学生毕业，父亲与各大学或有关单位联系，为他们安排工作。离校的师生给他的书信不断，他总是耐心地一封一封地写回信。有的亲友学生家境贫困，他都给予帮助，有的从中学到大学都是父亲资助的。不管住在什么地方，他和左右邻居的关系都处得很好。

公书林和图专的经费出现拮据时，父亲就给国外图书馆界友人及美国的基金会写信，他的书房不时地传出打字声。

我的父亲是位真正的爱国者，我听他感慨地说过：“外国人认为中国是‘东亚病夫’、‘一盘散沙’，他们才敢欺侮我们、侵略我们，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内部不团结，科学又落后，所以一定要兴办教育，图书馆事业正是教育的基础”。他抱着教育救国的思想，把自己的一生定位于发展中国的图书馆事业。解放前，凡是与图书馆事业有关的事，他都积极参加，但与之无关的党派活动，他都避而远之。

朝鲜战争时，为了保家卫国，他把自己在武昌的住房和积蓄都捐献出来。他还讲述过1911年武昌起义时，他给黄兴的起义军抬过伤兵的故事。

我的父亲是个心胸开阔、处世豁达的人，在一些政治运动中，他受了不少委屈和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从不耿耿于怀，而是以大局为重，他认为只要国家兴旺发达，个人委屈算不得什么。

根据教学需要，他以近七十的高龄埋头苦学俄语，在短期内编译并讲授“俄文编目学”，退休之后，他仍在编写教材，念念不忘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我远在广州,因为不能侍奉年迈的双亲而深感内疚。在 60 年代生活困难时期,我总设法寄饼干、椰子糖之类的东西给二老,但听姐姐说,他俩还将它们分送亲友、邻居。

1977 年 2 月,我父母同一天仙逝庐山,我携女儿、外甥女等去庐山奔丧,我们把父母的骨灰安葬在土八岭的山顶上。我想以先父的事业、贡献、人格在高山之巅安息是当之无愧的。

沈宝媛 1997 年 5 月

自序

历史犹如奔腾的江河滚滚向前,当我国图书馆事业即将告别 20 世纪迈入新纪元门槛的时候,蓦然回首,在 20 世纪的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历史波涛中涌现出了无数的风流人物。他们或则随着滚滚的洪流已在历史的舞台上匆匆而过,或则正在随着滚滚的洪流登上历史的舞台,然而,有的犹如过眼云烟消失在历史的波涛之中逐渐被人淡忘了,有的则犹如不朽的丰碑在历史的波涛的荡涤中越来越伟岸挺拔、光芒四射。这本书所描写的正是 20 世纪中国图书馆历史上的一座不朽的丰碑——沈祖荣先生的光辉而伟大的一生。

我之所以热衷于研究沈祖荣宗师,并最终完成了这部沈祖荣评传,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为了实现个人多年的夙愿并完成许多人想为而不敢为不能为的心愿。

可以说,我写作这本书的第一个动因乃是出自对沈祖荣宗师的无限敬仰与钦佩,而这种无限的敬仰与钦佩则源自于由许多个偶然构成的必然。我出生在大别山那个全国有名的贫困县红安县的一个极其坎坷的知识分子家庭,自懂事起,过高的阶级成分和父亲的莫须有的“历史问题”已压得我几乎要窒息,根本就不敢奢望任何前途。十年浩劫结束后,抱着唯一的一线生机和最后的机会,我参加了全国高考,结果竟在全县名列前茅。为了走出那个封闭的山区,到大城市去寻找一片净土,父亲帮我选择了图书馆学专

业,因为只有大城市才有图书馆。于是,我于1979年迈入了中南第一高等学府武汉大学,就读于自己一无所知的由沈祖荣手创的享誉海内外的图书馆学系。本科四年虽然成绩优秀,但对图书馆学既不热衷也不淡漠,平常而已,倒是在片断的学习中了解了不少有关沈祖荣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的历史,并由衷产生了几分敬意。1983年,为了实现父亲的心愿,我又在仓促之间报考了研究生,为了保险起见选择了中国图书馆史研究方向这个冷门,尽管考试成绩不理想,但终究是在众人之中脱颖而出,成为大陆第一个中国图书馆史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从师于中国图书馆史研究权威谢灼华教授门下。在谢灼华恩师的指导下,我逐渐爱上了图书馆学,而随着对沈祖荣宗师了解的增多,这种情感亦越发加深了。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洋洋洒洒近十万言,竟选择了学禁未开的《中华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与评价》,并由此加深了我对沈祖荣宗师的敬仰,确立了研究沈祖荣宗师的心愿。

事实使我不得不相信缘分。1988年底,也就是在我到中山大学图书馆学系(现改名信息管理系)任教的两年之后,沈祖荣宗师的小女沈宝媛有一天到系里来拜访前辈周连宽教授,我们在系办公室不期邂逅,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情感使我们很快成为忘年之交。其后,我曾多次采访沈宝媛和林念祖,他们夫妇二人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在学识和年龄上都是我的长辈,我称他们为伯父伯母,而他们待我殷情备至,逢年过节,他们总是不辞辛苦来看望我这个知书不达礼的小字辈,令我感激万分,惭愧万分!1989年3月,根据个人所掌握的史料和沈宝媛伯母林念祖伯父提供的一手史料,我完成了四万余言的《一代宗师 千秋彪炳——论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先生的生平及其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卓越贡献》的论文初稿。在这一年的秋天,沈宝媛伯母又及时地给我提供了美国学者 Cheryl Boettcher 在《Libraries&Culture》杂志上发表的论文《Samuel T. Y. Seng and the Boone Library School》,使我及

时地对论文初稿作了部分史料补充。1990年,正当我的这篇论文开始在《图书馆》杂志上连载的时候,以王振鹄教授为首的台湾图书馆同仁在隔绝四十年之后第一次大规模地访问大陆,寻根会友。9月22日,沈祖荣宗师的公子沈宝环教授在只身赴广州与家人团聚期间,特地访问中山大学。于是,我作为唯一的小字辈又得缘拜见沈宝环教授。回台北后,沈宝环教授在发表的《本是同根生——我看大陆图书馆事业》一文中还专门提到了我的研究。后来,沈宝环教授被聘为广东省图书馆学会名誉理事,在多次的交往中,沈宝环教授亦成为令我敬仰的良师益友。

1992年10月,我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图书馆学信息学研究生院作一年的访问学者。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是,有一天,我的导师、前美国图书馆协会(ALA)主席、研究生院院长林奇教授(Beverly P. Lynch)特地向我介绍了我一直联系未果的美国沈祖荣研究专家 Cheryl Boettcher。我原以为 Cheryl 是位大教授,没想到她当时仅是该院的一位博士研究生。她有一个很好的中文名字叫做白齐茹,现在已改名 CherylBoettcher Tarsala(戴求礼)。尽管她是一个道地的美国人,但中文讲得很好,对中国图书馆的历史,尤其是沈祖荣,了解和研究的程度超过了大陆的许多学人。频繁的畅谈和交往,使我又结识了一个学术知己,在我回国时,齐茹将她所有的沈祖荣研究资料复印,专门送给了我一份,这使我感到了美国学者的无私和真诚,这也不能不说是缘分。在美期间,由于意外得到一笔资助,我又有缘在曼哈顿纽约公共图书馆寻访了半个世纪以前沈祖荣在美国留下的足迹。

资料的积累越来越多,对沈祖荣宗师的了解越来越深入,于是敬仰与钦佩之情也就越来越浓厚,写作的决心也就越来越大。

我写这本书的另一个动因则是出自对大陆图书馆界学人研究的愤懑和个人的历史责任感。

现在图书馆学界的新生代对历史毫无兴趣,甚至厌恶,因而图

书馆史的知识几乎一贫如洗,成了盲目追逐时髦的一代。而中老年的能够有所作为而又着力作为的鲜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沈祖荣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奋斗了大半个世纪,至今逝世也已近二十年了,但直到九十年代以前对于沈祖荣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

1980年,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黄宗忠在《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6期)上发表了《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六十年》一文,其后又在《图书情报知识》(1981年第1期)上发表了《进一步加强中美两国图书馆学和情报学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一文。黄宗忠老师思想很敏锐,更敢于高唱新论,在这两篇文章中,他完全否定了50年代以后大陆图书馆界对韦棣华的种种极“左”批判,重新高度地评价了韦棣华。1981年6月,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的两个学生在《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1981年第3期)上发表了《关于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史评价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就韦棣华评价问题同黄宗忠同志商榷》一文,对黄宗忠的正确而科学的评价给予了回击,重新以极“左”的观点否定了韦棣华,否定了文华图专,满纸的极“左”余毒。事隔四年,另一个人在《四川图书馆学报》(1985年第5期)上发表《评韦棣华》一文,与前面的两个学生一唱一和,对韦棣华、文华公书林、文华图专进行了全面的否定,通篇整个就是一篇“文化大革命”的批判稿或大字报。倒是两年后,徐全廉在《四川图书馆学报》(1987年第1期)上发表的《评〈评韦棣华〉》一文说了一些公道话,重新肯定了韦棣华、文华公书林、文华图专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我要说这些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这些文章虽然是评价韦棣华和文华公书林与文华图专的,并没有直接评价沈祖荣,但是,全面地否定了韦棣华、文华公书林和文华图专,不也就是全面地否定了沈祖荣吗?二是,“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就已结束,而在其后的十年中“文化大革命”的余毒竟然还是那么深,“革命小将”还

是那样勇往直前以愚昧去与科学斗争,可见,思想观念的转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对于沈祖荣的研究大致起于 80 年代初。1981 年,文华前辈张遵俭在《图书情报知识》(1981 年第 2 期)上发表了《昙华忆旧录——记沈祖荣与韦棣华的遇合》一文,1982 年张遵俭又在《图书馆学通讯》(1982 年第 2 期)上发表了《昙华忆旧录——回忆沈绍期师》一文。这两篇短小的回忆录虽然还不是专门的研究论文,但总算是开了个好头,况且当时张遵俭身体健康状况很不好,年事亦高,的确是难能可贵。1983 年文华老前辈严文郁在台北《传记文学》(第 42 卷第 5 期)上发表《图书馆教育之父沈祖荣先生——为其百年冥寿纪念而作》一文,该文虽亦有回忆性质,但颇多公允评价,尤其是“图书馆教育之父”的提出非常令人钦佩,因此,这篇文章可以算是研究沈祖荣的开始。

1989 年,我的师妹胡先媛在《高校图书情报学刊》(1989 年第 3 期)上发表了《沈祖荣先生传略》一文,虽然文字不多,但可以算得上是当时唯一全面记述沈祖荣生平的著述。几乎与此同时,美国学者白齐茹(Cheryl Boettcher)在美国《Libraries and Culture》上发表了长篇弘论《Samuel T. Y. Seng and the Boone Library School》,对沈祖荣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评价(后台湾有译文发表)。她的研究虽不乏可商榷之处,但是,其史料之丰富、论证之充分、观点之正确,无不令我折服。尤其是,她还是身在局外的美国人,美国人尚能做到如此地步,而我们却不能,这既令国内图书馆界学人感到羞愧,又令我们愧对先贤和历史。

自 1990 年至 1991 年,我的论文《一代宗师 千秋彪炳——记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先生》分五期在《图书馆》上连载,这得益于我的挚友,该刊的副主编韩继章的大力支持。韩继章负责《图书馆》杂志的编辑多年,不仅对图书馆学术十分敏感,而且极富开拓精神,他凭藉着一份专业杂志不断地诱导图书馆学术研